

源于自然经济的封建专制制度既无法自我衍生近代民主思想，又排斥来于异质文化的近代民主思想，这就造成国人对民主思想理解的种种偏差，使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尤为艰难。时至今日，民主化仍是悬而未决的难题。历史的反思，我们仍不得不去探究——

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的症结

桑 兵

作为近代化的重要构项，民主化在中国比工业化更加举步维艰，历经磨难。长期反复阵痛后产生的畸形物，最终演变成社会变革的重大政治难题。然而，如果不能冲过这道瓶颈，涌向现代化的洪流必将暗潮丛生，前途莫测。无民主的古代和变动不居的当代，自然使人们将反思的目光投向在民主大旗下英勇奋进的近代风云变幻历程。令人惊异的是，近代中国的种种反民主倾向，不仅产生于专制集权，而且潜藏于民主化的阵阵热浪之中，现实与人们所预期的往往正相反。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只开花不结果，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变种怪胎的症结究竟何在？

解谜的关键之一，在于重新认识民主理论。

什么是民主？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隔膜，我们对民主规范的认识至今仍然相当肤浅、朦胧，并且严重的扭曲变形。作为由权力来源所决定的权力结构及运作，民主包括社会体系、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人三个层面。社会体系表现为五种权力关系：一、社会团体在决策过程中是否以团体成员为主人，并以多数取决方式处理团体事务。二、国家政权与其他社团间是绝对的任意统治，抑或相对限制，多元还是一元。三、政府权力是否来自人民，并受其控制支配。四、在权力组织与运作上，中央以及中央与地方间是分权还是集权。五、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强权控制。这一总体结构要求民主不仅应具有权力本身的相互制衡，更重要的是形成决定政治制衡的社会制衡机制，才能切实保障。因此，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规范就是自由平等是否作为最高准则为社会成员承认和奉行，并形成道德和习惯力量。而个性解放导致的主体意识增强，将提高公民的责任感和权利义务观念，尊重人权法制，适应缓慢而稳健的民主决策和领导方式。可见，民主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形式即政体问题，更非政治手段。

解谜的关键之二，在于认识一般性民主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特殊性的联系与区别。作为外部文化的异体移植，民主进入中国，兼有社会进化的一体性和文化生成的异质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中国社会，自然会产生异体排他作用。但在统一的世界体系形成时代，很难设想可以由非民主化途径进入现代社会。民主要在中国植根，必须依据既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作适应性调整变化。而要防止橘逾淮化为枳，民主的基本规范准则和制度程序又不能放

弃或改变。民主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所面临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异质环境，造成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殊困难。

基于以上两点，重新考察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发现许多症结甚至死结。

一、国情与国是的缠绕。所谓国情，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心理结构素质。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形成广泛的平等意识，产生民主要求的必要前提，而文化素质及文明发达程度与民主欲望的强弱成正比。但是，国情只是变革的依据，国是才体现为方向。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如果不仅是简单地在既定社会中寻找实现民主化的依据和前提，等于根本否认民主的现实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化就是与既定国情格格不入。因此，不是从传统社会的国情出发，判断民主化有无实现的可能性，而是必须改变现实，以促成实现民主的条件。推行民主制本身就是最有效的促进方法。统治者常常以国情为盾牌，不允许民众创造实行民主的条件，又借口条件不成熟来剥夺民众的权利，这正是国情中阻碍民主化实现的最严重病灶。

二、主导性载体与主体性载体的混淆。民主化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又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形成，因而必须特别重视先导媒介力量的地位与作用。近的统治者以及遭受挫折的改革者，往往把民主受阻滞缓的原因归结为民智未开。开民智无疑是实行民主的必要条件，但社会各群体的文化文明水准具有不平衡性。下层劳动群众作为民主化的主体性载体，仍然处于自在状态。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的民主热情，只是古代平等思想的重新浮升。他们是民主化潜在的主力等。而绅商们过于功利化的民主意念，则是随着要求改善振兴实业条件而萌生的模糊意向，很容易同样出于自身利害考虑而放弃，与旧势力妥协。由近代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作为主导性载体，对民主制度具有强烈的主观愿望和热切追求。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巨大。这种差异使得近代中国一方面在总体上民主精神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民主运动周期性爆发。以下层群众“民智未开”指责主导力量的民主热望是无根的超前意识，抹煞近代民主运动高潮迭起本身就是民智已开的表现，这既不符合世界范围的民主实践，更不利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即使在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现代发达国家，一般民众对民主理论规范的认同也比较低，往往是抽象原则肯定，具体问题上甚至持相反态度。因此，社会精英对民主规范的认同实际上起着维护和引导民主制的支柱作用。在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层、群体和利益集团时民智不可能同步开通。尽管民主制在形式上意味着承认大多数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但在实际进程中，特别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能依据不同区域和社会集团民智开启的程度，实行区分层次，各有侧重的差别程序。近代中国的革新倡导者虽然意识到民主制不能一步到位，但由于未能正确认识主导载体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在实践中便出现程序错位现象。或将主导力量的认识等同于一般民众，试图以乡村和城镇基层为起点推行民主制。这样的自下而上恰好是从最缺乏民主意识的层面开端；或以主体力量的蒙昧规范主导力量，要求后者顺应前者，使之处于被压抑和受束缚状态，导致为民主而起的冲突和斗争周期性爆发。如此一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便陷入两难的困境，未经启蒙教育的主体力量不断被徒劳无功地推上民主制轨道，而强烈要求民主制的主导力量的愿望反遭扼杀。中国近代化本来不可多得的动力在这种两难境地中双重耗费，相互抵销。笼统地规定民智开通与否的统一尺度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民主化不仅应当视主导力量在不同地区、层次、领域和组织中分布的疏密及意识的强弱为据设置程序，而且要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对于不能自发产生民主精神的主体性载体，首先是改变物质条件，进行启蒙教育，使之滋生民主

意愿和需求，然后通过示范性引导和影响，将其领向民主化正轨。对于接收和传播民主思想的主导性载体，则应在实行民主制的过程中加强适应性训练，并充分发挥其宣传鼓动和现身说法作用，为民主制度的普及进行探索和示范，逐步向全社会推广。这样既可避免主要载体民智未开成为整个民主化进程的负累，又可使主导力量蕴藏的宝贵民主活力不致无效耗费，循序渐进由消极遁辞变成积极方针，使民主化进入良性顺态发展轨道。否则，主导力量斗争的失败成为民智未开的论据，主体力量试验的挫折又导致民主无用的心理倾斜，循环往复，遗患无穷。

三、政治斗争如何实现取得政权前后由权威领导向民主政治过渡转换。近代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形式又是武装对抗。为适应军事化斗争的需要，以对付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民主阵营内部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权威领导。但是，民主与集权的对立冲突使得权威化的领导存在着向专制独裁政治蜕变的潜在危险，领袖本人容易陶醉于绝对权威的任意行使中，萌发普渡众生的优越感，把自己看成民众的天然代表和民主的化身，并在为民请命之中变成救世的“世之主”。而民众则易于产生英雄崇拜，把领袖当作救星和神圣加以迷信。集权是专制的基础，而专制是集权的极端表现。不受制约的权威与盲从的民众相互作用，一旦夺取政权，权威领导很容易向专制集权政治体制转接，使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蜕变成权力中心的更替，民主成了争权夺利的手段，形成上台前大声疾呼民主，掌权后恣意推行独裁的恶性循环，酿成民主运动造就独裁政治的悲剧。二十世纪初年，孙中山即认为促使拿破仑和华盛顿选择帝制与民主的根本原因在于势。然而，势由人造，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的自觉，无疑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无法制约的道德自觉，又为事实证明是最不可信赖的。

四、社会体系上如何正视和利用权力本位，通过国家政权这根强有力的政治杠杆来推进民主化，同时改造政治杠杆的结构与运作。在中国，国家政权对于整个社会具有超常支配控制力。作为政治理性力量，国家政权在改良社会经济基础，更新文化土壤，筑造民主温床，开展启蒙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清末“新政”虽是半自觉半让步的产物，社会变化却十分明显。但是，国家权力杠杆在社会生活中的超大能量，从根本上说是由产生专制集权的社会条件所造成，权力结构和运作与对专制皇权的需求相吻合。而国家政权的过渡膨胀，正是民主化所要改变的社会现实。可以说利用或凭借国家政权这根政治杠杆推行民主化的最终目的，在于限制约束和逐步缩减杠杆本身的能量。忽视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或一味依靠权力杠杆，都将阻碍或改变民主化进程。民初孙中山让位和宋教仁专注于议会政治，是以理想代替现实的教训。而戊戌维新失败和辛亥后革命党人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则是过分依赖甚至强化政治权力的恶果。执政者的自觉有助于民主化，但只有在不自觉也被迫行动时，才能有效地防止由于迷恋权力而过度强化权力的功能。

五、如何使民间社团发展为实力团体，形成对各级政权的社会制衡力量，同时更新其内部结构。这样一方面防止社团对政权产生依附性，另一方面避免民主制衡演变为单纯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社团，包括宗族组织、会馆公所、秘密会社和文人结社等，多属血缘宗法制或封建结义制，只能作为专制统治体系的附属共生体或带有对抗性的调节补充机制存在，本质上并不否认专制主义。近代以来，特别是戊戌以后，中国涌现出大批不同形式、性质、规模的功能性社团，如行业性的学会、商会、教育会、校友会，地域性的自治会、同乡会，以及政治性的爱国革命团体和学术性的专业文化团体。在民主思潮风

行的影响下,开始这些社团大都体现出较强的民主精神,按照民主制进行组织和活动。但在此后发展过程中,缺乏对权力中心抗衡制约能量的事业文化团体,由于主观上没有团体独立的政治意识,从而被动地为权力任意指使,逐渐养成依附性,成为半封闭的民间社团。即使最有成效的上海绅商地方自治组织,也不能对地方政权形成有效制衡,反而让官府的支配权逐步扩大。而以政权为奋斗目标的政治性社团,为了在长期尖锐对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积蓄保持独立性的必要政治经济实力,内部结构往往呈集中趋向。并且对政权的要求越直接完整,等级越高,集权倾向就越明显。康有为要求变法维新,对弟子门生却是一付教主的独尊架式,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内也长期实行集权领导。辛亥前各地的政治团体在光复后迅速分化组合,演出了一场派系权力角斗的大混战。如果不从权力来源上健全社团民主制,专制传统浓厚的中国甚至可以利用社团组织的民主形式来美化 and 强化专制独裁。因此,通过非集权化途径大力增强民间社团的规模数量和政治经济实力,使之真正成为民间独立实体,造成有效的社会制衡机制,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实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六、如何解决传统大一统政治与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民主化转型接合,避免社会重新陷入千百年来统一与分裂的恶性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古代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模式,分裂割据的地方势力和集中统一的中央王朝在权力结构上都毫无例外的属于专制。单纯依靠加强中央集权来防止分裂,在清代的政治体制设置和运行上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完善,皇权绝对权威之下的中央与地方以及军政、政政间的相互牵掣,保证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但是,近代政治风云的变幻表明,这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由于争权夺利而引起的分裂活动。而且正因为专制政治使权力对社会生活具有绝对支配力,权力意味着一切,必然加剧个人野心的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分权非不能瓦解专制,反而必然导致分裂,破坏统一。

就国家政权与全体社会成员关系的疏密程度而言,这种大一统与近代民族国家相比只是更加专制,而不是更加统一。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是由层层相属的等级封建制向近代统一国家转变的历程,在民主制的基础上加强社会成员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专制制度下国家政权对社会的过度干预,正是权力与民众疏远的表现。摆脱权力控制的积极意义在于更多的社会成员主动参与政治,而不是相反。然而,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个本质意义上出现扭曲变形。专制皇权被推翻,旧的中央集权制约力消失了,新的民主制衡机制尚未形成。地方实力派打着民主的旗号要求中央分权,对下则继续实行专制统治,衍化出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下层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血缘纽带出现断裂,士绅影响号召力下降,失去维系作用,国家政权的触角不断下延,使得集权统治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辛亥革命以后,名义上实现共和制,实际上专制主义双重强化。二十年代中央统一与联省自治的冲突矛盾,不过是千百年来统一与分裂的翻版。国家统一与民主自治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完善过程中两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方面,谐调的关键在于真正解决权力来源和权力系统的结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制,才能摆脱维护统一就不得不加强专制集权,而集权又必然导致争权夺利的分裂运动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使国家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和民主。阉割了民主的实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变成统一一旗号下专制主义的胜利进军。

七、以非民主甚至反民主规范为民主的倒错意识。由于文化背景的歧异,导致近代中国人对于异体移植的民主思想观念理解的误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下列三种关系认识的模糊:1、古代传统民本、平等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关系;2、自由民主与伦理政治泛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3、个性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儒家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驭民

术，而下层群众的平等要求则是他们拥护皇权的思想基础，绝对平均必须由绝对权威自上而下地贯彻和维护。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将民本平等思想附会于近代民主思想广为宣传，按照民本平等观念来理解民主原则，必然导致在民主的幻影中接受专制集权的社会现实。中国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政治泛化的社会，由此产生两种追求民主自由的偏向，或者以为脱离现实政治的控制就可以获得自由，或者希望通过对权力的依附或占有来获得自由。然而，生活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不可能摆脱政治制约，而依附权力本身就是丧失自由的开端。在中国，只有在政治现实中争取到并由制度化保障的民主自由，才具有实际价值。诚然，国家民族不独立解放，个性自由就不可能实现，但国家民族的解放决不意味着个性自由的自然实现。天下已任的抱负志向激励无数志士将个人自由融进对群体自由的追求之中，淡化了的个性主体意识在加强群体力量的同时，却弱化了区分权威意志与国家民族需要的鉴别力。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与群体自由相互促进的个性自由发展限度，逐渐向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种高级境界迈进，仍然悬而未决。

生成系统与接受系统的文化歧异认识偏差，由此形成民主倒错意识，具体表现为：1、将开明君主或圣贤哲学倡导的某些观念或行为准则视为民主类意识，如清官政治，伯乐相马的人才观，士为知己者死的食客寄生性，君民舟水鱼水说等。2、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想或异端学说直接等同于民主思想，如古代平等观。在总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主要作为专制思想体系的必要补充。3、将某些作为专制制度点缀装璜的民主躯壳视为民主的象征，如附庸性的议会，官僚化的公仆，地方豪强的伪自治，政党专政、无民意的选举表决等。这种情况长期普遍存在，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的功能作用的误解和偏见，统治者的歪曲阉割异化为被统治者有形无用的实际感受，滋生出淡漠甚至抵触情绪。4、心理上习惯于权力中心本位的约束，一旦脱离，反而产生失重感，无所适从。即使民主要求最为热切的学生，也普遍存在权威服从的集体无意识。不适应民主化自律缓慢而稳健的谐调发展，只好忍受专制统治痉挛式的跳跃跌宕，民主化进程螺旋大而螺旋小。5、以伪民主排斥和否定民主化的基本思想准则和制度规范。这是倒错意识的极端表现。一些权力到手的昔日民主斗士，将其徒具形式的变种标榜为民主的正宗，站在他们的所谓“民主”立场上，指责真正的民主原则规范为反民主的异端邪说，诬蔑民主运动为破坏民主的暴行，诋毁个性自由的正义追求为威胁民主制生存的恶习，不自觉地粉饰其半权势半依附地位。他们自以为坚持民主，其实是美化专制。对民主规范的反认同倾向，造成中国民主化的最大悲剧。

症结不祛，中国民主化进程不仅在时空上受阻，而且结构体系支离破碎，内容形式严重脱节。结果，民主的每一项成就，都不可避免地转成为强化专制主义统治的新包装。在社会文化环境制约下民主制度的变质，一方面使各种近代政治组织形式与专制集权结合，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真正民主精神准则和制度规范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困难。人们以反民主的权威神圣崇拜来歌颂民主先驱，又以反异端的姿态来抗拒民主的精灵。近代中国的可悲，不仅在于民主欲望太少，而且在于人们不知民主为何物，不以没有民主为苦，更在于一些人视民主为反常，甚至从“民主”的角度来论证民主的确反常。与不能自觉的奴隶相比，这种认认真真粉饰自己奴隶地位的奴才，乃是窒息中国民主空气的一大毒瘤。消灭奴才，解放奴隶，祛除顽症，中国的民主化终有凯歌高奏的一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 李杨)